

西方语言学经典书系

Language, Its Nature, Development and Origin
语言论：语言的本质、发展和起源

[丹麦] 奥托·叶斯柏森 (Otto Jespersen) /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西方语言学经典书系

Language, Its Nature, Development and Origin

语言论：语言的本质、发展和起源

[丹麦] 奥托·叶斯柏森 (Otto Jespersen) / 著

刘小侠 / 导读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语言论：语言的本质、发展和起源=Language, its nature, development and origin: 英文 / (丹) 奥托·叶斯柏森 (Otto Jespersen) 著. —影印本.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6.10

(西方语言学经典书系)

ISBN 978-7-5192-1926-0

I. ①语… II. ①奥… III. ①语言史—研究—英文 IV. ①H0-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45016号

著 者：[丹麦] 奥托·叶斯柏森 (Otto Jespersen)

导 读：刘小侠

责任编辑：陈晓辉

装帧设计：春天书装

出版发行：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137号

邮 编：100010

电 话：010-64038355 (发行) 64015580 (客服) 64033507 (总编室)

网 址：<http://www.wpcbj.com.cn>

销 售：新华书店

印 刷：三河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11 mm × 1245 mm 1/24

印 张：20.25

字 数：482千字

版 次：2016年11月第1版 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5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联系调换)

西方语言学经典书系

专家委员会

主 任 沈家煊 陆俭明 胡壮麟 桂诗春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言仁	王 寅	王立非	王初明	王建勤
王洪君	文秋芳	方 梅	石 锋	冉永平
冯志伟	宁春岩	朱庆之	任绍曾	刘丹青
刘振前	江 荻	杨永林	杨亦鸣	杨信彰
李小凡	李向农	李柏令	李战子	吴海波
吴福祥	岑运强	何自然	汪国胜	沈 阳
张 博	张伯江	张德禄	陆丙甫	陆汝占
陈永明	胡建华	姜望琪	祝畹瑾	姚小平
袁毓林	顾曰国	钱 军	郭 锐	高一虹
高立群	黄国文	曹广顺	崔 刚	崔希亮
彭宣维	董秀芳	程 工	程晓堂	曾晓渝
熊学亮	潘文国			

海外专家委员会

主 任 黄正德 贝罗贝 丁邦新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惠	石定栩	石毓智	冯胜利	朱晓农
刘勋宁	孙景涛	张 敏	张洪明	徐 杰

总策划 郭 力

导 读

刘小侠

1. 引言

19世纪中叶，历史比较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得到确立后，研究重点转向这门学科跟一般学科的关系。受自然进化理论的影响，人们开始谈论语言的“生命”、新语言的“出生”、古语言的“死亡”，就好像语言与植物和动物一样是个生命体。

Jespersen认为，这样的比喻有掩盖语言的本质之嫌。与植物、动物不同，语言不能独立于人而存在，它没有自己的“生命”。“语言的实质是人类的活动，是一个人让另一个人了解自己的活动，是这另一个人了解前一个人的想法的活动。”（Jespersen, 1924: 2）。因此，“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忽略说话的人及其以特定的方式行事的目的”（Jespersen, 1922: 7）。

以上语言观决定了Jespersen对语言的研究是从以人为中心的观点出发。他指出，在其他科学领域，不考虑人的因素是个优点，但“鉴于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的性质，我们必须经常注意人的利益，只从这个观点而不从别的观点衡量一切”（Jespersen, 1922: 324）。

Jespersen认为，如若将语言与“生命”关联起来的话，那么“生命”的意义应与上述比喻不同，它指的不是生物体所具有的存在和活动的的能力，而是说话个体习得、发展、影响和改变语言的持续过程。

《语言论：语言的本质、发展和起源》一书，即是在如此定义“生命”的前提下，对说话个体“语言生物学”的概述。

2. 本书的结构

本书由四卷组成：

第一卷：语言科学史；

第二卷：儿童；

第三卷：个体与世界；

第四卷：语言的发展。

读者可能会问：这四卷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单从每卷的题目来看，他们之间似乎没有很强的逻辑关联。但若放到说话个体的“语言生物学”的框架下，就不难看出，前三卷是第四卷的基础——作者试图通过对儿童如何习得母语、人作为语言使用者如何影响语言的观察，找出人类语言的起源和发展这两个问题的答案。

第一卷“语言科学史”，回顾了古代至20世纪初的语言研究史，目的是展示语言的起源和发展这两个问题之前的研究状况。

第二卷虽名曰“儿童”，实则是在可观察的环境下，在童年阶段找寻个体语言能力发展和变化的趋势，以揭示人类语言的开端。

第三卷“个体与世界”，处理了语言接触与冲突、女性对语言的影响，讨论了语言变化的诱因。

第四卷“语言的发展”，回答了两大问题：①语言是进步了还是衰退了；②语言的起源。

3. 本书的背景

3.1 语言的起源：一个被禁声的话题

有学者称语言的起源是“科学界最难的问题”（Christiansen & Kirby, 2004），足见这一话题曾引发的高度争议。

1859年，Charles Darwin（1809—1882）的《物种起源》问世，起初并未处理人类的进化问题。但不久之后，Thomas Huxley（1825—1895）在自己的著作《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1863）中宣称，人类是通过自然选择从非洲人猿进化而来的。神创论的捍卫者Max Müller（1823—1900）（1861/1899, 1: 22–23, 354）称，语言

是区分人类和“畜生”的关键性证据。对此，Darwin（1871：61）回应道，人类的语言可能源于动物的叫声，即语言的最初形态来自模仿或拟声。一时之间，各种猜测和争论甚嚣尘上，然皆“捕风捉影之言，除己之外无人信服之见也”（Whitney，1875：279）。

1866年，巴黎语言学会（Société de Linguistique de Paris）发布了学会章程，明令禁止其会员对语言的起源这一话题做任何辩论。章程第二条宣称：“学会将不接受涉及语言起源和创造世界通用语之任何评论。”^①1872年，伦敦语言学会（London Philological Society）也发布了相似的声明（Corballis，2007）。

一个多世纪后，John Lyons回顾这段历史时说道：

关于语言起源的进化论，大多数语言学家倾向于持不可知的态度。心理学家、生物学家、行为学家等，若其愿意，都可能会说，语言一定是从某非语言信令系统（signaling-system）演化而来；而语言学家会回复他们，该观点没有来自语言本身的实际证据支持。（1977：85-86）

巴黎语言学会的禁令对西方学界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自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语言的起源都是学界的禁忌。^②

3.2 语言的发展：新语法学派的语言变化观

另一方面，以经验数据为基础的对语言变迁历史的研究，逐渐形成了历史比较的原则和方法，成为研究语言发生发展规律的科

① ART. 2. - La Société n'admet aucune communication concernant, soit l'origine du langage, soit la création d'une langue universelle. SLP I, 1871, p. III-V, cf. <http://www.slp-paris.com/spip.php?article5>

② 20世纪90年代，关于语言进化的研究再度兴起，研究角度多元，研究方法各异，呈现出自然科学与语言学交叉之势。相关研究大致可以分为：①认知科学与语言进化（cf. Chomsky，1993、1995；Hauser、Chomsky & Fitch，2002；Jackendoff & Pinker，2005；Givon，2009）；②语言产生的计算仿真研究（cf. Hurford，1989；Steel，1996；Kirby，2000、2007；Smith et al.，2003；Gong et al.，2005，2009；Kirby & Hurford，2002；Steels，2012）；③MtDNA或Y染色体遗传分布的系统分析（cf. Cann et al.，1987；Underhill et al.，2000）；④遗传学、考古学和语言学数据合成（cf. Cavalli-Sforza et al.，1988，1992）。

学。到巴黎语言学会发布禁令之时，历史比较语言学以德国莱比锡为中心形成了一个立论鲜明的学派——“新语法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包括Karl Brugmann（1849—1919）、Hermann Osthoff（1847—1909）、Berthold Delbrück（1842—1922）、Eduard Sievers（1850—1933）和Hermann Paul（1846—1912）。

新语法学派研究的重点是语音和方言。他们系统地研究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论基础，提出了两个著名的论断：第一，纯语音变化绝对有规律，即“语音定律无例外”；第二，语法变化基本遵循类推原则，即“由类推得出的形式联想”。他们认为，所有语音变化都是完全规则的，以机械的方式同时影响所有相关的词汇；而类推则是按照心理原则进行的。机械性和心理性分别是语音变化和类推的特征。此外，新语法学派强调语言变化源于说话者个体，因此极为重视个体心理学。

4. 语言的起源问题：Jespersen的态度

在以上历史背景之下，出版于1922年的《语言论：语言的本质、发展和起源》一书，可谓是巴黎语言学会禁令下的一个例外。^①

对于巴黎语言学会关于语言起源和世界通用语的禁令，Jespersen在本书中做出了明确的回应：“这两个问题是能够以科学的精神进行探讨的，因此不应因受到特别排斥而导致无果而终。”（1922：96）

Jespersen之所以认为可以对语言的起源进行科学的研究，是因为此前40年间发生了几种态度上的转变。首先，生理语音学、词法学、句法学、语义学等领域开始倾向于将词看作句子或连贯话语的一部分，而不是孤立的单元。其次，学者们对重音和音高的兴趣不断增加，并由此开始调查句重音和句韵律，开始关注形式和功能之间的关系。再次，随着对语音学和语言心理学的重视，观察真实的日常语言现象变得愈发必要，对活语言的研究态度发生了改观。

Jespersen认为，抛弃前人不成熟的结论无可厚非，但将问题也

^① 另一个例外是Morris Swadesh（1909—1967）于1971年在美国出版的《语言的起源与多样性》。

一并抛弃掉，是绝对错误的。好的问题要一遍一遍地问，直到找出完整的答案为止。仅满足于对孤立的词、形、音做细致的对比，而拒绝面对起源和演进这样的大问题，只会使语言学视域狭窄、荒芜贫瘠。

5. 新语法学派语言变化观：Jespersen的批判

Jespersen认为，当时语言学缺乏见识的主要原因是忽视了所有与语言评价相关的问题。什么是判断某个词、某种形式优于他者的标准？语言中逐渐发生的变化总体看来是裨益还是损害？能否创造出一种世界语使不同国家的人不费力气地交流？这些被当时大多数语言学家或排斥、或轻视、或一笑置之的问题，正是他认为应该得到严肃讨论和科学对待的问题。

Jespersen认为，语言变化原因各异，需进行个案研究，而不能一概而论。新语法学派的所谓“语音定律”只是一种倾向，且该倾向只有在未被其他因素取代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才会发挥其影响。本书中，Jespersen通过对儿童和成人语言变化、语言接触和冲突、语言快速变化时期的分析，提出了简易理论和价值原则。Jespersen相信，所有人身上都有一种心理力量在起作用，那就是倾向于“懒惰、惰性、逃避、随便、散漫或其他已被发明的表示‘省力’或‘避难就易’的动听的同义词”（Jespersen, 1922: 263）。简易倾向在语音、词汇、句法、语义等语言发展的各个层面都起着重要作用（详见第十四章）。另一方面，语言是人与人之间的交际活动，涉及说话人和听话人双方。当说话人说话的时候，总伴随着他对听话人能否根据他的语言表达加以推理、理解他的思想感情这一问题。针对这一问题，Jespersen指出，在评价一种语言或一个表达式时，听说双方都必须加以考虑：说话人费力最小、听话人收效最大的是最好的语言或最佳的表达方式。

此外，Jespersen通过提出同距变化、趋同变化和趋异变化以及语音定律的扩展、分析语音定律和词源学的关系，对新语法学派的语言变化观进行了批判（详见第十五章）。

6. 内容提要

6.1 第一卷：语言科学史

本卷主要处理19世纪西方语言学史。与另一位丹麦语言学家Pedersen同一时期出版的《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1924/1931）相比，本语言学史有几点值得注意：

6.1.1 撰写目的

Pedersen的《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是一部独立成书的史著，其目的是阐述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产生、发展和意义，介绍对世界各语系进行历史比较研究的成果。而本卷的语言学史是《语言论：语言的本质、发展和起源》体系结构中的一部分，其目的是展现本书要回答的问题，即语言的变化、发展和起源问题，及其在语言学历史上曾经是如何处理的，以便形成关于语言演进的综合理论。

6.1.2 撰写视角

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是欧洲学界研究的主流，也是科学化人文学科的一个重要标志。当时语言学研究的首要对象是语言史和亲属语言比较，Pedersen本人的主要精力也投入于此，他的史著是一部历史比较语言学史，对普通语言学的历史基本上没有涉及。相比之下，Jespersen的语言学史关注了人类语言的性质、结构、运用等语言学中的一般性问题，这一点从他对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的评述上可见一斑（详见第二章）。Humboldt的语言学研究大致可以分为语言的历史比较和类型比较，Jespersen对Humboldt的评述则明显着眼于后者，以其阐释普通语言学的巨作《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1836—1840）为中心，对其关于语言的本质、语言参与认识活动的作用、语言的分类等观点进行了细致的评价。

鉴于以上，Jespersen一方面关注了一些被其他语言学史忽略的学者，如从美学角度对语言而非其历史进行比较研究的Daniel Jenisch（1762—1804）；另一方面关注了杰出语言学家未受到足够重视的贡献，如Rasmus Rask（1787—1832）从语言结构整体而非细节出发对古冰岛语的起源进行分析的方法和以“语音变化定律”闻

名的Jacob Grimm (1785—1863)在句法方面的著作。

6.1.3 一些术语

术语是体现作者语言观和方法论的最直接路径。如同Jespersen的其他著作(cf. Jespersen, 1909—1949, 1924, 1933, 1937), 本卷对一些常见术语进行了重新界定, 对另一些常见术语采用了不同的称谓和表述, 特别值得注意的包括:

(1) philology

philology, 现常译为语文学, 以前有传统语文学、文献学、文学、语言学、言语学、古典语言学、比较语言学、历史语言学等种种不同的译法。philology一词来源于希腊语philologia, 它由philos和logos两个词组成, 前者意为“爱”, 后者意为“词”“言语”, 合起来意为“学问之爱”“文学/文献之爱”。因此, philology最初表示的是一种对学问、文学/文献以及推理、讨论和争论的热爱。^①后来渐渐地被专业化为专指对语言的历史发展的研究, 特别是到了19世纪, 历史语言学研究在欧洲学界兴起, 成为philology的主流。

本书中, Jespersen在提到philology一词时, 其意与古希腊传统中的宽泛定义接近, “英语常译之为含义模糊的‘学问’之意, 也就是对一个民族的具体文化的研究”(Jespersen, 1922: 64), 而非历史语言学。^②因此, 当他讲到“以前常常感到的关于同一门语言的语言学(linguistic)研究和纯语文学 philological)研究之间的敌意已趋于消失”(Jespersen, 1922: 97), 他指的是将语言作为科学和将语言看做民族文化这两种研究倾向之间的张力——在后者中语言是达到目的的手段, 而在前者中语言本身就是目的。

① 18世纪修辞学家Gorge Campbell (1719—1796)指出, “历史、民事、宗教、文学、语法、语言、法学、批评都是其分支”(1776/1988: 125)。

② 很多语言学家都意识到区分语言学和语文学的必要性。Bloomfield对语文学的定义为“对国家文化的研究”(1933: 4); Pedersen认为其研究任务为“阐释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中所表现的某段时间的精神生活”(1931: 79); Gray认为语文学一词的意义, 严格地讲, “指的不仅是对语言的研究, 也是对文献、对一个民族所有的文明现象的研究”(1939: 3); Whorf指出“主题、文化数据、历史在语文学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但是在语文学的基础部分一定要有语言学”(1941: 502, 转引自Landa, 2003); Robins指出, “在德语中, Philologie更多的时候是指对文学文本的学术性研究, 但广义上讲是通过文学作品对文化和文明的研究……这与其在美国学术界中的用法一致”(1964: 6)。

(2) Gothic^①

Jespersen认为英语中与“日耳曼语族的”相对应的术语“Germanic”含有歧义，因为“Germanic易被误解为‘德语的’（German），易给人造成德语比其他日耳曼语言更重要，甚至是日耳曼语族诸语言的来源的印象”（Jespersen, 1919: 1）。《英语的成长与构成》第三版（1919）一书之后，Jespersen不再使用该术语，而代之以丹麦语文学家和历史学家Gudmund Schütte（1872—1958）在1912年创造的新词“Gothonic”。

(3) Aryan

另外一个被替换掉的常用术语是“印欧语系的”（Indo-European）。Jespersen认为，该语系是一个包括多种语言在内的庞大语系，各语言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而“印欧语系的”不能充分体现其复杂性，应代之以“雅利安语的”（Arian/Aryan）。雅利安语，即后来分化成这些语言的原始语，“其语法、词汇结构极其复杂，充满了不规则性”（Jespersen, 1919: 2），因此以其命名更为恰当。相应地，“原始印欧语”（Proto-Indo-European language）也不再使用，而代之以“原始雅利安语”（Proto-Aryan language）。

6.2 第二卷：儿童

6.2.1 方法论背景：日志记录

自19世纪开始，日志记录（diary keeping）是儿童语言习得研究的主要数据来源。到20世纪上半叶时，其复杂和精细程度达到了新的高度。

当时语言习得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词汇、句法、话语之复杂度的发展（cf. Sterns, 1907; Pelsma, 1910; Bateman, 1916, 1917; Nice, 1917, 1920, 1925; Bean, 1932）；第二类，音的早期习得（cf. Ronjat, 1913; Holmes, 1927; Rottger, 1931; Lewis, 1936; Gregoire, 1937; Jakobson, 1941; Wellman, 1931; Shirley, 1933）；第三类，儿童双语教育及其对发展中儿童的潜在危害（cf. Ronjat, 1913; Pavlovitch, 1920; Leopold,

① Gothic这一术语在语言学界从未流行，可能是因为很容易联想到Gothic，而后者也很难确切定义。

1939—1949; Smith, 1935, 1939, 1949; Saer, 1923; Arsenian, 1937)。

1916年, Jespersen出版了对其子Frans习得丹麦语的日志记录《儿童与成人的当代语言》。本卷再次考察了其观察所得。除对Frans的观察外, Jespersen也采用了大量来自其他作者的日志数据, 其中包括Clara Stern & Wilhelm Louis Stern^①、Michael O'shea^②和 Jules Ronjat^③的数据。本卷对以上三大主题都有涉及, 但更侧重于音、词和语法的早期习得。

6.2.2 儿童的创造力

对于儿童是否能创造新词, Wundt认为“儿童语言是儿童所处环

① Jespersen用“his”指称这本著作, 实际上该著作是由Clara Stern和Wilhelm Louis Stern夫妇共同完成。这多少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当时女性参与学术研究的状况。Clara Stern (1878—1945), 出生于德国柏林, 父亲是位银行家。她没有上过大学, 因为当时德国大学不接收女学生。Wilhelm Louis Stern (1871—1938), 德国心理学家, 1897年至1916年执教于波兰布瑞斯劳(Breslaw)大学。在布瑞斯劳大学期间, Clara和Wilhelm设计并系统地执行了一个儿童发展项目, 该项目的目标是完成包括语言习得在内的儿童发展的各个重要方面的系列研究。Clara负责数据收集, 她对他们的三个孩子(分别出生于1900年、1902年和1904年)进行了日志记录, 从他们出生之年开始到1912年为止, 每天一页以上的记录, 累计记录达5 000页。Clara的记录包括两种: 第一种是全天候观察, 记下任何她认为与孩子发展相关的地方, 如从对光、声的反应, 到咿呀学语、学习新词的模式, 以及最初对叙述、撒谎和道德判断的尝试; 第二种是系统化记录, Wilhelm启发孩子进行图片描述、故事叙述、短剧评论等, Clara迅速记下孩子们说出的话。他们对日志进行定期分析, 以建立孩子语言发展的倾向。Stern夫妇的《儿童语言》(1907)是20世纪最先出现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关于语言习得的著作, 它将19世纪日志记录法转换成现代客观数据库方法, 为严格区分数据和注释建立了新的标准, 呈现了历时数据库如何系统地测试重要的理论问题(参见Willem J. M. Levelt, 2013: 309)。

② Stern夫妇在德国出版《儿童语言》的同一年, Michael Vincent O'Shea在美国出版了《语言发展与教育》。Michael Vincent O'Shea (1866—1932)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教育学教授。他的《语言发展与教育》记录了他的四个孩子从出生到能掌握听说读写的过程。该书是作为教育心理学的教材而著, 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关于语言发展的, 讨论了从出生到学龄的各个发展阶段, 从呱呱坠地的啼声, 到包含屈折、一致、否定、从句在内的复杂句法; 第二部分是关于教育学的, 涉及如何阅读、如何提升表达、如何训练美文写作, 以及如何教授二语。

③ Jules Ronjat (1864—1925)是法语语言学家, 1913年以对其子Louis双语教育的日志记录研究获得巴黎大学博士学位。自儿子出生起, Ronjat夫妇遵循一人一语的原则, 自己只对儿子说法语, 而妻子只对他说德语。Ronjat的观察是, 两种语言的语音系统一开始就被清晰地分开, 无证据表明法语语音系统的习得受到了延迟。尽管词汇和句法干预时有发生, 但相对而言并不频繁。

境带来的结果，在这个问题上儿童本质上是被动的工具”（1900：296）。受其影响，Sterns（1907）对句法形式的发展谈及甚少，但有一小节提到了词序。他们认为模仿性和自发性是决定句法形式的两大因素，其中模仿是默认机制，即儿童是被动的（cf. Stern, 1907：126，273，337ff.）。^①对此，Jespersen持鲜明的反对意见。他认为任何发明都建立在现有事物的基础之上，儿童通过采纳来创新，采纳是重新赋值的积极过程。^②他将儿童发明的词分成三类：第一类，音和义都由儿童赋予；第二类，成人赋音，儿童赋义；第三类，儿童赋音，成人赋义。

6.2.3 拟声

Jespersen认为拟声（echoism）在儿童语言习得，尤其是尝试造句时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儿童会不假思索地重复听到的话、简单的短句或短时记忆能够保存的句末部分。Jespersen认为拟声解释了：①截短的单词，如用chine代替machine，用gar代替cigar。②儿童倒装词序，如在英语里说She comes和Now she comes，但在丹麦语里说Hun Kommer和Nu Kommer hun. 即副词后词序会倒装。儿童会重复Kommer hun，并把这种词序应用到无副词的情况中，说Kommer hun而不是hun Kommer。③不定式的高频使用，如Not eat that是儿童对you mustn't eat that的重复。Jespersen认为拟声使儿童成为语言变化的一个因素。

6.2.4 Jespersen的发现

Jespersen发现：①在邻近音的同化、辅音群的脱落、音或义的逐渐改变方面，儿童和成人所起的作用是密不可分的。②词的截短、词首脱落可能是源自儿童，而词末脱落则是由成人所致。前一种变化的例子有：用rella代替umbrella，用Bert代替Albert等。Jespersen解释说，这

① 值得注意的是，波兰语言学家Jan Baudouin de Courtenay（1845—1929）在1869年发表了一篇关于语言习得的文章，“对儿童的观察”（Einige Beobachtungen an Kindern）。Courtenay对他的儿子和女儿习得波兰语进行了大量的、系统的数据收集，他的数据库有13 000页，包括11 452个话语转录，该数据收集模式代表了Stern（1907）著作出版之前的最高标准（参见Joachim Mugdan, 1984），其中他还注意到了Jespersen（1922：107）提及的现象：儿童语言中k和g被前移为t和d，这种现象后来被Jakobson（1941）称为语言进化中音变的平行体（parallels to sound shifts）。

② Sterns在《儿童语言》1928年修订版第390页回应了Jespersen的批评，认为Jespersen没有区分嬉戏的、一次性的“发明”和成为儿童词汇一部分的持久性发明，他认为Jespersen的所有例证都属于前者。显而易见，Sterns没有意识到，一次性还是持久性都是发明，这不是儿童的发明能力问题，而是语言群体是否愿意接受其发明的问题。

主要是因为当儿童第一次听到某个词时，听到词尾时往往已记不得词首。后一种变化的例子主要是姓缩短：用Goldly代替Goldsmith，用Pop代替Popjoy。Jespersen解释说，儿童使用的主要是名而不是姓，姓的词未脱落是成人造成的。③音或义不经任何中间阶段的突然变化，词语的混乱和词语间的错误划分，一个词突然变为两个词，这些变化可以完全或主要归因于儿童。他进一步指出，儿童也可能通过下面的方式间接地施加影响：成人发现儿童的用词并传给其他人；成人改变自己的语言以满足儿童的需要。后一种方式常造成“童语”（nursery language/baby talk）的产生，而且这种语言的一些形式可能会在日常话语中固定下来。

6.3 第三卷：个体与世界

6.3.1 语言接触与冲突

6.3.1.1 基层理论

基层理论（substratum theory），由意大利语言学家Graziadio Isaia Ascoli（1829—1907）创建，指发生种族融合时一个种族往往放弃原来的语言而采用另一种族的语言，但依然保留许多原来的发音习惯。于是，新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旧语言的痕迹，并由此在新语言下面形成一种语言基层。征服语的变化被看做是这一语言基层影响的结果。譬如，凯撒在公元前一世纪征服了欧洲西部地区高卢（Gaul），使得聚居于高卢地区的凯尔特人放弃了自己的语言高卢语而改操拉丁语，但此后当地拉丁语的一些变化，如[u]前移为[y]被认为是由高卢居民以原来的言语习惯发音造成的。

“基层理论”多被用来解释一些在年代久远的语言冲突中出现的语音替换（参见Feist, 1913: 480 ff.），但由于对被代替的语言几乎一无所知，这种解释并不十分令人满意。Jespersen认为“基层理论”经不住具体例证的推敲。一方面，从[u]到[y]在凯尔特语中并非普遍性转变；另一方面，从[u]到[y]的转变在未受到凯尔特语影响的地方，如古希腊语、瑞典语中，也可见到。

6.3.1.2 借用

Jespersen注意到，虽然语音替换在语言分化方面起不到什么作用，但在外来词的形成中的确起着巨大作用。本族语的音常被用来代替外来词中不熟悉的音。比如，英语通过把最后一个音节的元音

双元音化，来借入诸如bouquet[bu'keɪ]、beau[bəʊ]这类词。而且，借词的重音和声调也会发生改变，以符合本族语的习惯。

Jespersen发现，借用主要发生在词汇这一层面，通常被借用的是“实词”（名词、形容词、实意动词）而不是“虚词”（代词、介词、连词、数词、助动词）。但在有些语言混合的情况下，借入语的语法也会受到一定影响。在这一方面，英语中的“独立主格结构”（如：weather permitting, everything considered）可能完全是模仿拉丁语句法的结果。

6.3.1.3 权宜语

当操不同语言的群体第一次接触时，有时会形成一种极为有限的语言系统来满足基本的共同需要。在此之后会形成“洋泾浜”（pidgin）；再往后，当洋泾浜被一些人作为第一语言学习时就变成了“克里奥尔语”（creole）。但Jespersen并未区分“洋泾浜”和“克里奥尔语”，而是把他所关注的语言称作“权宜语”（makeshift languages）或“最简语”（minimum languages）（1922: 232），包括西太平洋岛屿的土腔英语（Beach-la-mar），用于中国、日本和美国加州的洋泾浜英语、毛里求斯克里奥尔语（Mauritius Creole）和奇努克混合语（Chinook jargon）等。

Jespersen认为这些语言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混合语（mixed languages），因为它们的确有一种“基础语”（base language）——西太平洋岛屿的土腔英语和东亚洋泾浜英语的基础语是英语、毛里求斯克里奥尔语的基础语是法语、奇努克混合语的基础语是印第安奇努克语。前两者中偏离英语的地方，一方面源于外来者学习上的缺陷，另一方面源于英语为母语者和外来者讲话时采用的一种类似于大人和幼儿说话的方式。也就是说，故意使用支离破碎的英语，以为这样对方理解起来更容易。

这些“权宜语”表现出相似的显著特征：词汇基本全部来自英语，数量极其有限，语音结构和语法极其简单，规则具有一贯性。譬如，名词、动词和形容词总是保持原形。Jespersen非常欣赏这些语言语法结构的简洁性。他把毛里求斯克里奥尔语看成是一种“已真正成功地用最可能简单的方法和完美的规则建构起精细、丰富的动词系统”的语言（1922: 227）。但是，他们的简洁性是以歧义和难于表

达广泛的概念为代价的，因此是“语言贫乏的结果”（ibid: 234）。

6.3.2 女性语言

Jespersen谈到，在世界上的一些地区，男女有各自的语言，这种差异可能与语言禁忌有关，如对于非洲东南部班图族的一支祖鲁人，女性不得提及丈夫的父亲及其兄弟的名字。但在多数情况下，这两种语言的界限并不清晰。

一般认为，女性倾向于遵循标准语或传统语言。在这种意义上，女性似乎比男性更为保守，而厌恶陈腐、平庸的男性可能会成为语言的主要革新者。

语音方面，Jespersen认为女性曾在全颤音[r]的弱化上起到重要的作用。颤音弱化是社会生活变化带来的结果，随着女性生活重心从野外转为户内，以前响亮的舌尖颤音变得柔婉和缓。但现在总的来说，男性和女性在语音上几乎没有差异。

相比之下，女性和男性在用词、文体方面的差异则大得多。女性的词汇量不够丰富，尤其欠缺综合性和技术性词汇；女性敏思快语，但对音上的声学特性和义上的微妙差别甚少在意；女性会避免提及某些身体部位或使用粗言秽语，会创造一些委婉的表达方式。Jespersen认为，这类差异主要是由女性受教育程度、^①社会风俗习

① 受Darwin (1871: 252 ff.) 性别选择论 (sexual selection) 的影响，欧洲世界一度对女性参与高等教育普遍持消极态度。据Rowold (2010: 206)，19世纪七八十年代德国人认为“女性心智能力有限”，英国人则担心“高等教育可能会让女性身体退化”。19世纪中叶以前，欧洲所有高等学府都对女性关闭。只在个别情况下才有女性获得特许以旁听生的身份在大学学习。19世纪末，欧洲开始出现女子专门学院。但在德国、奥匈、瑞士和法国，公立大学是获得高等教育和职业培训的唯一路径，公立大学却只接纳男性。据Freidenreich (2009)，瑞士的大学在1867年后开始接收女性，德国和奥地利的大学则直到20世纪初才开始接纳女性。据UNESCO的一份报告 (1972)，法国、荷兰、芬兰、丹麦分别于1868年、1871年、1873年和1875年开始允许女性参与高等教育。

在美国，独立战争与内战期间的女权运动对女性获得高等教育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美国于19世纪初相继出现了女子专门学院，19世纪30年代出现了世界上第一所男女同校的学院 (Oberlin College, 1833年创立，1837年开始招收女生) (cf. Solomon, 1985; Faragher & Howe, 1988)。

在亚洲地区，日本女性高等教育始于19世纪末 (1874年设立的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中国女性高等教育始于20世纪初 (1905年中美合办的岭南大学开始兼招女生，1919年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创建，1920年北京大学首次开始招收女生)。

值得注意的是，女性参与高等教育之路发展缓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处于弱势地位。据UNESCO (1972)，到20世纪70年代女性学生才与男性学生在数量上基本持平。